

Accept or Resist?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hip in Cyber Era

Yu Xiucan Tang Zhengm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xponential growth of moder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omputer technology has affected and changed contemporary life, making lif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but also bringing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data privacy and algorithm ethics. In 2020, a news report entitled “Takeaway riders trapped in the system” brought the human-technical relationship back to the social focu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emerged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of the person, reflecting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yber er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in the cyber era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technological inequality, algorithmic bias, and false freedom brought about by modern technology under the ownership of oligopoly and monopoly companies. Furthermore, i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rgument”, we should embrace technology with reservations.

Key words: Cyber era; Human-technical relationship; Space-Time compression; Implicit bias

接受还是抵抗？赛博时代的人技关系

余秀才 唐争鸣

摘要：当下，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指数级增长的现代技术影响并改变了当代生活，使生活

作者简介：余秀才，中南财经政法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唐争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研究生。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培育项目交叉学科创新研究项目“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生成与管理研究（2722020JX00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长期研究项目（2017-2021）“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理论面临的挑战与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引用：余秀才，唐争鸣。接受还是抵抗？赛博时代的人技关系[J]。中国新闻评论，2022，3（1）：29-36。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1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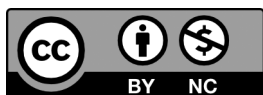
变得便捷高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包括数据隐私、算法伦理在内的系列问题。2020年，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新闻报道，使人技关系重回社会焦点。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已出现从人外到人内具身的趋势，体现了赛博时代的基本特征。本文试图以赛博时代人技关系为切口，探讨在寡头与垄断公司拥有下现代技术带来的技术不平等、算法偏见以及虚假自由的问题，进一步说，在“技术决定论”与“技术中立论”影响的时代下，我们应有所保留的拥抱技术。

关键词：赛博时代；人技关系；时空压缩；隐性偏见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40年前，威廉·吉布斯（William Gibson）在创作《神经漫游者》时，也许不会料到，赛博格如此影响了人类生活。进入便携化通信终端商业化的智能时代，移动设备部分上已经取代了人脑的功能。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外化”器官，能够协助人脑完成包括记忆、运算在内的多重功能。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包含数据隐私、算法伦理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赛博格（Cyborg）一词最早于1960年《航天学》9月刊上发表的《赛博格与空间》一文中克莱恩斯（Kleins）与克兰（Klein）所提出。他们将“cybernetic organism”（控制有机体）两个词各取前三个字母构造了一个新词：“cyborg”旨在描述一种通过用技术来改造人体以适应太空生存的能力。

赛博人的概念也随之诞生。赛博人，在哈拉维（Haraway）1985年提出的“赛博格宣言”中，被定义为“物质，机器与生物体的结合，例如安装了假牙、假肢、心脏起搏器等的身體，这些身体模糊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在他的想象中，未来人类将以“义体”的方式与机械结合，而机械化身体能够实现作为有机体的人类无法实现的运算力与动力。换言之，为了追上技术发展的脚步，人类与技术结合的“赛博人”将成为技术发展的最终形态，“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也将瓦解。”

这种界限消失并非无迹可寻，根据唐·伊德（Don Ihde）的观点，技术对身体的嵌入是“准透明的”，无所不在且难以察觉，即具身的技术。眼镜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技术具身的实践，

它以低存在感的方式辅助人眼以实现对世界的感知，而在日常使用中眼镜以及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俨然是人的“外部身体”，在当下，VR/AR技术更拓宽了人类感官的边界，放大了视觉效用，以达到虚拟现实的沉浸效果，某种意义上而言，“人机互嵌”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反思“赛博时代”：技术使人更自由了吗？

当下，社交媒体的发展使人与人的交流突破了距离的限制，尤其是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云交流、云互动、云互联已经成为当下生活的常态。现实场景提供的地域物理连接与身体在场已不再必要。云会议使身体在场的会议场景不再必需；线上教学突破了物理空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流动；互联网“在线”实现了人际交往中保持联系的便利。拥抱技术，成了当下人们的共同选择。

在技术的深度参与下，从未有任何时代比当代更便利。在新闻领域：新华社“快笔小新”机器人已经能自主完成新闻稿件；在音乐领域，网易推出的AI作词，已能实现多种主题、歌词押韵的要求，高效地完成歌曲制作；在招聘领域，人工智能机器人“Lina”在互联网企业招聘中的广泛运用，使招聘时间缩短了90%。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度参与使赛博时代的到来变得并非遥不可及。

正如梅洛维茨（Meyrowitz）所述“行为场所不一定需要有确切的地点，决定行为的因素往往是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当下的需求”，^①创造沟通的条件比前往沟通的地点更重要。外卖软件使使用者不再需要亲自前往线下便能获得想要的食物，以微信、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轻松。

地域物理连接所需的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是以网络化社区的形态出现，而形成网络化社区的群体重新连接拥有共同兴趣与爱好的圈层，而这种情感上的“在场”往往比物理空间的“相见”给予了双方更多的陪伴感，也更加稳定。互联网虚拟空间也使得“缺席的在场”成为可能，互联网技术使得永久在线的状态得以延续，从而提供了持续联系的场域。在媒介技术发展运用下，现实场景正被虚拟场景取代，虚拟场景已经可以承载现实需要的大部分需求。

当智能技术变得如此普及后，我们也愈发离不开它。当技术成为一种难以从生活剥离的存在时，人们也失去了选择的权力。技术的门槛将没有拥抱技术的人筛除出去，也使得人们不再

^① [美] 约书亚·梅洛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3.

拥有抵抗技术的自由。技术的发展同样没有回退的按钮，当智能的趋势同浪潮一般不断向前，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未来，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它也必将会到达终点。

自蒸汽机从人类社会中广泛运用起，能源革命带来的技术的发展就以不可阻挡的态势影响了人类生活。技术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学习并使用技术，才能从被淘汰的恐慌中喘一口气。费希尔（Fisher）称之为“冲击——影响”模式，技术可以将“他们基本特征”转移给用户，印刻在用户个人和集体心智中，并以此改变历史。他认为技术从外部世界进入社会，从而给社会带来“冲击”。^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非在使用技术，更像是“被技术使用”，我们用技术的时间越长，受到技术的影响也越大。改革开放后，随处可见的电脑学习班回应了一代人离开工厂无所适从的工作状态。在当下，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老年人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使用手机，否则缴纳社保可能是当下最难解决的问题。人们使用手机打发碎片化的时间的同时，手机反过来培养了移动时代的非线性阅读习惯，使得现代人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变得更短了。为了重视被缩短的注意力，视频网站发明了倍速功能，人们在使用倍速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失去”倍速的依赖。

二、虚假的赋权——时空压缩下的技术幻象

选择接受技术亦或是选择抵抗，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现代技术已泥沙俱下的裹挟了所有人。人们发觉，技术赋权的观念是一种谎言，是一种工具论的幻象，所谓技术赋予的权力本质上是信息的效用，其作用是使人更了解权利本身。精准扶贫并非物质上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一种信息扶贫，使偏远不发达的地区人群知晓因信息传达效率导致的政策错位，例如医保、助学政策。这种权利被距离遮蔽，却属于我们自身，并非技术赋予。

技术的幻象的另一面是技术看似使生活变得便利，却使我们丧失了生活本身。维利里奥（Virilio）提出：“在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似乎没有‘路途性’这个从这里到那里，从一个到另一个运动的存在的位置，而没有它，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随着年岁流逝而相互接替的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体系……因为运输和传输运动的速度的本质导致人类环境的‘景深’的、因而也就是人类环境的光学厚度的一场衰变。”^②

维利里奥提出的“景深趋零”与项飏提出的“附近的消失”异曲同工，它通过比喻的方式试图演绎技术拉近了我们与渺远地区的联系，即时通信软件使“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同时

① [美] 南希·拜厄姆.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M]. 董晨宇，唐悦哲，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1.

② [法] 保罗·维利里奥. 解放的速度 [M]. 陆元昶，译.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3.

它也将我们的周遭推得更远。人们更关心自己存在的“居住”的空间与更广大的“社会”（由社交软件构筑）空间，甚至叫不出邻居的名字，失去导航软件后也无法掌握街边小店、临街餐馆在内居住空间的周围的状况。外卖软件和点评软件已取消了探索的时间而失去对周遭形成的同一处所的相处交流人际连接的耐心，这种由线性时间培养的逻辑的退化，使人们在更广大的“社会”空间中，对接收的丧失细节与动因的碎片化信息不假思索的接纳，仅获得并呈现情感化与极端化的外在反思。

进而言之，由技术带来的现代性是以压缩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把握作为代价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内向地朝着我们崩溃了”。^①这种通过技术手段加快的现代的速率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圈地运动起，通过物质化空间的方式，用金钱量化了空间，获取了对空间的掌握；而在当代资本的流动以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以积累与运作试图超越时间的边界，用全球化的方式消化生产出的过剩产能，这种类似均衡器的原理，使世界变得同一，也就实现了“时间压倒空间”。技术的加速使我们“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②而产生的相对时间，使“时间空间化”，这种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与不同时带来的差异化造成了现代生活的文化矛盾，而为了适应加速的现代生活节奏，人们的生活状态也实现了加速，其典型就是当下追求全球化速度以时间抢占市场空间的互联网996加班现状。

时空压缩的另一种体现是“幽灵工作”，一种伴随着追求更高效生产力机器分发给人工进行的采集判断工作。例如网上银行的人工识别以及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在这种“兼职工作”中，个人的存在被压缩进系统中。相较于生活世界，系统是一种合理化计算，规划出最优解决路径的集合。它使个人的价值被程序化运作为计算，解构了作为人存在方式的劳动的价值。同时这种强流动性、相对松散的“雇佣关系”也使得与劳资谈判的反馈变得艰难，个人只能受控地执行系统派发的任务。

当下，全球化的速率已遍及世界角落，其结果是出现了技术垄断的大型跨国公司集中出现。无论是硅谷流量四巨头FANG（Facebook、Amazon、Netflix、Google）还是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Baidu、Tencent、Alibaba），作为融合技术以智能化方式呈现获取商业的大型跨国公司，技术向善的理念只依靠自律约束无疑是脆弱的。因为即便在向善理念下，技术对于每个人便利也并非普世的。

① [美] 戴维·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40.

② 阎嘉. 时空压缩与审美体验 [J]. 文艺争鸣, 2011 (15): 1-3.

三、算法社会——后现代社会的隐性偏见

如果说技术是后现代社会的实现方式，那么算法就是后现代的语言。在当下，算法已经遍布现代生活的角落，无论是算法驱动的今日头条智能推送，还是导航的线路规划，程序驱动的算法成了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社会学家吉莱斯皮（Gillespie）认为：算法是基于特定的计算模式，将输入的数据转化为可预期结果的编码程式。^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算法是通过计算机为工具，以编程为手段，对海量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合理化分发的一种运算。

在Netflix纪录片《监控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算法被定义为“内嵌在代码中的观点”，影片中同时描绘了这样的场景：用户在算法世界中使用平台化社交媒体浏览信息，而荧幕背后的是为个人定制内容的“算法经理”。它们已达到参与度目标、增长目标、广告目标，为了吸引并留住用户，推送一个又一个吸引人的视频或信息，它们可能是你喜欢的女孩刚刚发布的微博，也可能是煽动极端情绪的宣言。

技术中心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算法的偏见并非是算法技术本身，而是机器学习过程中由于有限数据而产生的偏见，当样本量足够大，覆盖不同技术水平的不同国家后，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将会展现出每个人更需要的样子。

为了克服有限数据产生的偏见，改善算法本质提出了无限更新的数据要求，也将伴随系列新的问题：互联网公共领域发布的信息版权属于生产者还是平台方？内容发布后是个人还是企业对信息拥有永久垄断与处理权？互联网遗忘权的概念该如何界定？

当下，算法运算规则已然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究其根本，算法的本质上是為了以更高效达到结果的工具，是遵循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务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和手段，以期实现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用成为目的”^②的。它以目的为导向，不在乎过程与主体的，以结果为归宿，以理性效率至上。它的所有权属于企业，它的根本价值在于商业逻辑。大型跨国企业对技术的垄断造成了权力与话语的双重不平等，前者体现在被困在系统的外卖骑手手中的技术不平等，后者是因对抗平台的外卖骑手“江湖盟主”被开除的话语沉没。

公平性与通用性的改善也仅仅是技术内部的调整，数据来源不公正，机器学习的结果也将

① 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J]．思想战线，2019（6）：50-57．

② 陈昌凤，石泽．技术与价值的理性交往：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7（17）：71-74．

加剧不公正。一方面，算法的前期机器学习过程是需要通过人工锚点的方式进行，例如腾讯的“搜活帮”以兼职形式征集人工志愿者协助算法进行识别，也会带来难以避免的非系统性的隐性偏见，另一方面，资本优先的逻辑也使 Facebook 做出在禁止澳洲用户分享与查看新闻的决定，直面对抗监管。

算法追求以效率优先，受资本驱动，为利益掌控。算法可能是中立的，但绝不是公共的，它掌握在垄断公司的手中，不受任何约束，也将一直处于失控的风险中。

四、赛博时代的想象：我们该如何与技术共处

正如人们已经习惯于将重要信息记录在电子设备中一般，面对咫尺之遥的赛博时代，我们可能并未做好准备。电子便签成为承载思绪的载体，电子日历提示重要日期，而人们也不再需要记住熟人的电话号码。人们已经主动选择并毫不保留地拥抱技术，并将权力让渡给技术工具。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我们对技术的掌控，也逐渐失控。

海德格尔（Heidegger）将这种失控原因解释为“工具性与目的性分离”所导致的误解，工具论的技术观忽视了技术是工具与目的统一，“任何工具都服务于因而受制于某种目的，而目的也会创造自己的工具”，^①即技术本身也会出于目的主宰着自己的行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术不以人的操控方式体现善恶，技术的善恶体现在创造技术目的本身上。

在工具论的观点下，技术使得万物都成为被个人使用以改变世界的工具，它更是可以不假思索随时取用的道具。这种相信穷尽万物利用价值的工具论，使得人们对万物失去敬畏，也因此坚信在技术发展下，人类生活将会朝着自身所需要的方式优化。而工具论的核心技术，最终会使得人们在使用工具的盲目中被技术的目的所奴役。

赛博格的概念更像是一种对未来的寓言，相较于技术驱动下呈指数增长的计算率，千年演化下人脑的机能与半个世纪下计算机计算增长速率是不匹配的，囿于人类的物质性限制，人类的身体体质与思想容量本身基本上不会发生改变。从眼镜到 VR 眼镜，技术对人自身的改造将从外部逐渐延展到内部，对“技术”使自身变得更全能的渴望，不再局限于外部组件，从“数字化义肢”手机到嵌入式晶体，对运算、信息处理的需求逐渐演变成了改造自身成为更“完整”的人的需求，而当穷尽智慧探求智慧彼岸的时刻到来，“high tech, low life”的空虚时代也将到来。

进而言之，“内嵌式义肢”即便做得再发达，它的本质仍然是商品，其存在的意义必然是更新，最终转化为商业利益。“内嵌式义肢”无论如何演进，也将永远处于进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内

^① 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J]．求是学刊，2004（6）：33-40．

嵌式义肢”的迭代升级，像如今追逐年度的数码产品迭代一般，人们更新这些义体，在购买与使用商品中，将其逐渐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的同时，自身也最终成了商品的一部分。当人存在的本身被商品化，他的内容也将被形式支配。

五、结语

回到赛博概念诞生之初，控制论之父维纳（Wiener）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信息传递都是为了控制的观点。信息控制系统将信息发送出去并将结果反馈回自身，从而对信息的再输出进行修正。当今，系统已经做到了智能化采集，并通过机器学习自我修正。控制论的思想从二战后起源贯彻发展至今，已形成了完备的发展体系，同信息社会工业体系共同成长，使社会以更合理高效的方式运行。其代价就是追求理性可控效率最优的同时，无法量化以及纯理性思考的人类将从生产方式中解放出去。换言之，控制论最终目的也将是加速主义的必然后果，是时空压缩下寡头与垄断组织追寻资源最有效配置后，将人类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的最终结果。

赛博时代与技术共处的追问，本质上是如何面对因技术带来的不平等及在其影响下，如何获得有尊严生活的疑问。能够欣赏技术解放潜力的人，也将认识到其压迫个体的潜力，因此需要更有批判性的拥抱技术。控制论的乌托邦如何高效与先进，赛博时代也不可能只是机器繁荣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文学中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促进了抽象化美术的繁荣。创造性的工作是无法用机器取代的，看似无用的绘画、文学与哲学，也可能同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一样，打破未来对技术塑造的新神的崇拜。只有重新探讨人本精神，也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本精神，人技共生的时代才会真正降临。